

ARCHITECTURAL RESEARCH OF ZHANGYE GREAT BUDDHA TEMPLE

# 张掖大佛寺建筑研究

李江 吴晓冬 杨菁 著

甘肃河西  
走廊传统  
建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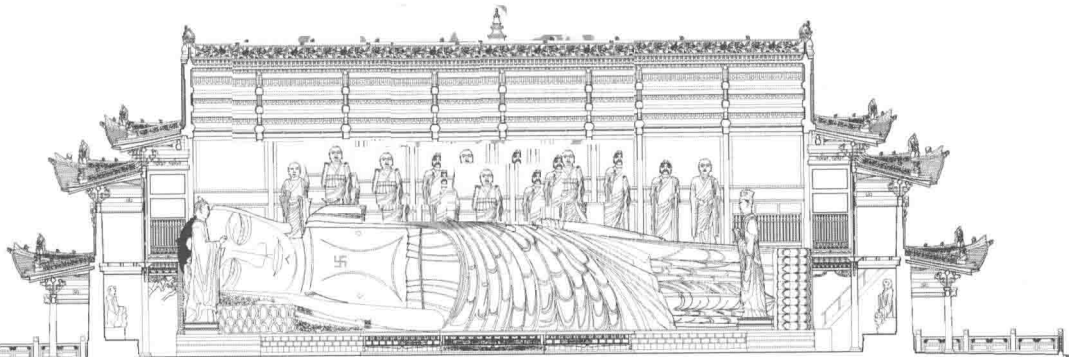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1408011、51508376）

ARCHITECTURAL RESEARCH OF ZHANGYE GREAT BUDDHA TEMPLE

# 张掖大佛寺建筑研究

李江 吴晓冬 杨菁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大佛寺所在的张掖城 / 5

第一节 张掖的地理历史 / 5

第二节 张掖的城镇建设 / 12

第三章 大佛寺的历史沿革 / 25

第一节 西夏、元代 / 25

第二节 明代 / 28

第三节 清代 / 30

第四节 民国及现代 / 33

第四章 大佛寺的布局 and 建筑 / 39

第一节 总体布局 / 39

第二节 单体建筑形制 / 43

第三节 法式特征 / 93

第五章 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大佛寺 / 95

第一节 河西地区佛教影响源流 / 95

第二节 大佛殿的藏传佛教特征 / 100

第三节 土塔的藏传佛教特征 / 109

附录 / 127

参考文献 / 151

# 第一章 绪论

## 一、张掖大佛寺<sup>①</sup>简介

张掖大佛寺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东临南大街，南靠南城巷，西抵大佛寺巷，北依民主西街。大佛寺前身为西晋的迦叶如来寺，现存寺院肇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历经兴衰，现存地面遗构均为明清建筑，主要由三座寺内原有建筑以及数座迁建至此的古建筑组成：前者包括大佛殿（图1-1）、藏经殿和土塔（图1-2），处于中轴线的核心地位，其中大佛殿内34.5米长巨型卧佛

图1-1 大佛寺大佛殿  
（来自《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



<sup>①</sup> 张掖大佛寺历西夏、元、明、清数朝至今九百余年，几经变迁，数次更名，为求叙述简明，本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均以现名“大佛寺”指称。



图1-2 大佛寺土塔  
(采自《西域考古图记》)

塑像，为全国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涅槃佛像，是大佛寺内的核心文物；后者包括原“行台”旧署（原址为明肃王府）大门、原陕西会馆钟鼓楼及牌楼、原文庙大成殿、原提督军门署二堂、原二郎庙清源殿等建筑单体，为避免拆除而集中迁建于张掖大佛寺。

## 二、张掖大佛寺文物价值

### 1. 张掖大佛寺见证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张掖是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上的必经之地，大佛寺屡屡见诸国际旅行者游记。1970年金塔殿遗址出土古波斯王朝银币，正是此间丝绸之路贸易的见证。此外，张掖大佛寺还突出体现了早期涅槃宗、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等不同佛教宗派的传承和变迁。

### 2. 大佛寺在佛教的传承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文化积淀

大佛寺及其前身迦叶如来寺，长期作为河西地区中枢寺院，在佛学东渐中如同一所驿站，在涅槃宗的奠定、早期的佛经翻译、佛

学弘扬、文献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某些轨迹。

### 3. 大佛寺的兴衰反映了历代朝廷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地区宗教生活的变迁

大佛寺曾有5次受皇帝赐名赐额，3次敕建，1次颁赐《大藏经》，是全国鲜有宠赐的寺院之一，并与历代8个皇帝和3个皇后有过密切的关系。各朝皇室对大佛寺建设、修葺、经籍的一再关注和重视，反映了各封建王朝在西北边陲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体现了大佛寺在促进西北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等方面曾发挥过桥梁和纽带作用。

### 4. 各类艺术形式与建筑相结合，使大佛寺成为综合的佛教艺术宝库

涅槃佛像配置其他泥塑群像，结合“都纲法式”的建筑空间、壁画及其他装饰手法，营造出震撼人心的宗教和艺术感染力，在雕塑史与建筑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另外大佛寺壁画、经书、佛曲等珍贵遗存也构成了佛教绘画、书法和音乐的艺术宝库。

### 5. 佛教文献和文献保管制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

大佛寺遗留了古代完整的佛教文献保管制度，并通过丰富的佛教题记和其他实物资料，反映了变化发展的僧、团结构，名目繁多的建制与僧职，等等。这为我们研究古代寺院经济、文化、管理制度，乃至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 6. 大佛寺建筑是明清河西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

明清以来，河西地区的建筑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营造技术和艺术风格。河西走廊的传统建筑主要选址在由祁连山发源的内陆水系所形成的绿洲中心地区。在中原汉式建筑的基础上，当地民众发掘、利用、适应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

的营造技术。在震害频发和湿陷性黄土的地质条件下，传统木构建筑大量使用椽扣、柱牵等本地域特殊的承重构件以加强建筑的整体性，并使用抹角梁法增强屋角部位的拉结作用。同时，河西走廊地处内蒙古草原文化圈、青藏高原文化圈的边缘地带，也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有效辐射区域。河西传统建筑广泛吸收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多种建筑特征。檐下做法非常注重雕饰，形成了具有标志性的檐下做法——花板代棋<sup>①</sup>。仿效礼拜殿扩大建筑进深空间而普遍运用勾连搭的屋顶组合方式。而佛塔的构成中，藏式白塔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空间处理方式与汉式建筑形式相结合，形成了“汉式”藏传佛教寺院新类型。而以河西地区大体量建筑之一的大佛殿为核心的大佛寺建筑群，则是河西建筑的重要实例和典型代表。

<sup>①</sup> 棋，现代汉语中写作拱，本书依建筑学习惯写为棋，如斗棋、代棋等。

## 第二章 大佛寺所在的张掖城

张掖位于河西腹地，地理位置举足轻重。

“土壤肥美，耕牧为宜，环以祁连、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鲜卑之水，控制羌胡，用武之地，外通哈密，内接关辅，边陲锁钥也。”<sup>①</sup>

张掖有祁连山来水的滋润，又处在东通西连、南来北往的十字路口上，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城市的选址和建设，千百年来形成了“苇溪连片，古刹遍地”的城镇面貌。

### 第一节 张掖的地理历史

#### 一、地理概况

大佛寺所处的甘肃省张掖市，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酒张盆地东端。祁连山绵延于其西南，最高峰西武当大山海拔3132米；北部为西北—东南走向的合黎山，海拔1600~3200米。中部的倾斜平原海拔1410~2230米，呈冲积扇形，由东南向西北敞开。张掖周围多高山、戈壁和沙漠，气候干燥，雨量稀少。蒸发量大，多风沙，冬长而寒，夏短而热，昼夜温差大，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河西走廊上最大的河流——黑河，在山间平原上由南至西北穿其境而过，密布的河网、充沛的水源灌溉着这方沃土，在戈壁滩上形成片

<sup>①</sup>（清）袁大化：《抚新记程》，19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片绿洲，滋养了历史悠久的文明和繁荣的文化。素有“塞上锁钥”之称的张掖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和“居延古道”的交会点，是连接内地和西域的陆路交通枢纽，古时武威以西翻祁连山至西宁的唯一通道也是以此为起点的。所谓“甘地当孔道，羌夷要冲，诚河西咽喉也”，“金城汤池，莫斯为重”<sup>①</sup>，足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sup>②</sup>。

## 二、历史背景<sup>③</sup>

历史上，张掖一直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在上古地理学文献《禹贡》中，张掖属雍州之地。至西汉前期，先后有西戎、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在此游牧。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击败匈奴，将汉朝疆域扩大到了河西走廊，并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置张掖郡，取“张国臂掖、以威羌狄”<sup>④</sup>之意。东汉初年，张掖为窦融所据，后归附于汉。魏晋南北朝时，张掖先后为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南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所属（图2-1）。十六国时期中原陷入连年的战乱，但河西地区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繁荣。张掖曾被北凉沮渠蒙逊定为国都，在西魏时始有“甘州”之称。

隋大业三年（607年），吏部侍郎裴矩前往甘州展开“互市”，即国际性的商品贸易。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甘州会见西域诸国君主和使者，并亲自主持“互市”。这件事在河西经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使张掖地区成为当时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唐初，甘州曾为李轨所割据，后为唐所平。在唐代前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贸易繁荣，甘州成为仅次于武威的河西第二大城市（图2-2）。在这繁忙的丝路上，张掖是个总枢纽，因

①（清）钟麇起：《甘州府志》，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② 张掖市志编修委员会：《张掖市志》，65-85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③ 整理自以下内容。

张掖市志编修委员会：《张掖市志》，65-85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方步和：《张掖史略》，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吴廷楨、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172-174页，236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④ 酈道元：《水经注》卷二。

图2-1 北凉永安九年（409年）时的疆域  
（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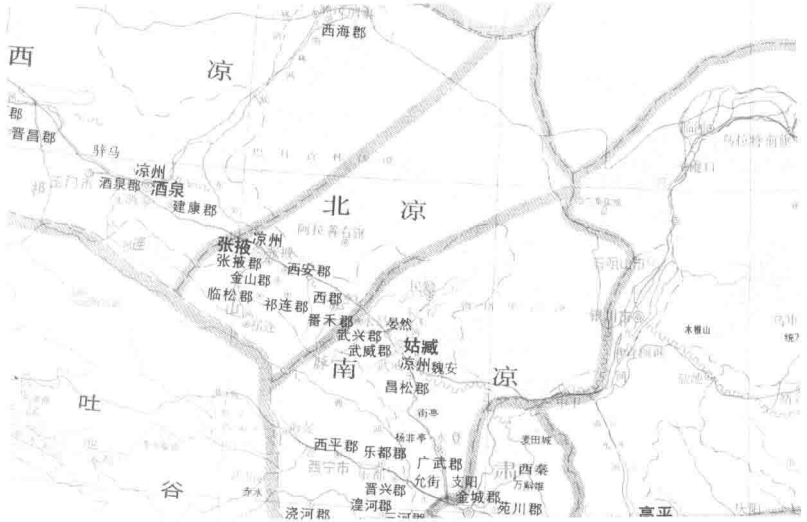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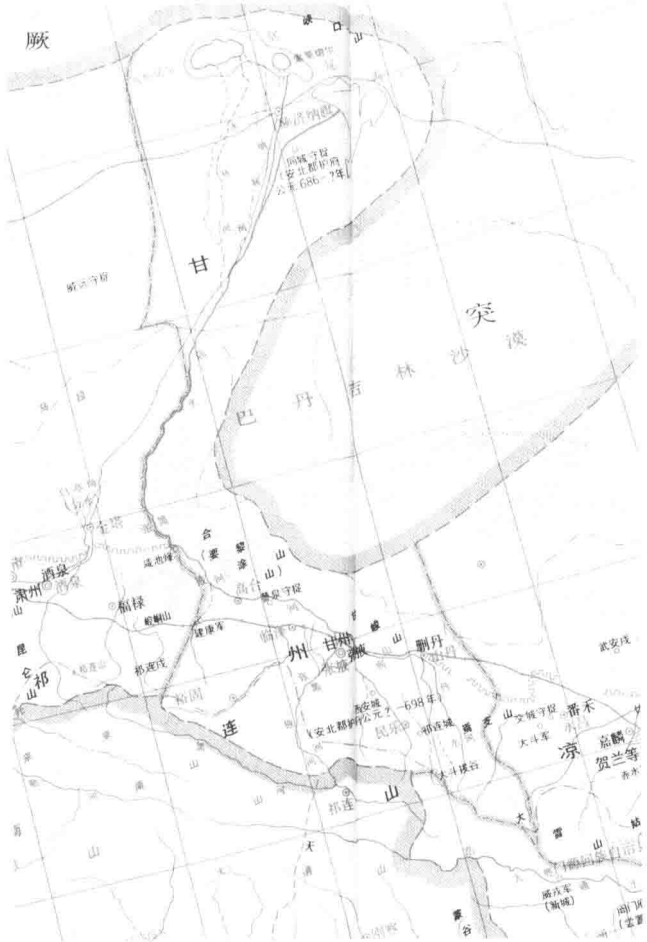


图2-2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时的甘州  
（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改动）



为丝路东段的各条路线最后都要在张掖会合。丝路畅通时，张掖为必经之地；中原战乱时，张掖则是贸易的终点站。很多唐代文书记载大批胡商专程到张掖贸易，也有很多胡商定居于此。天宝十四年（754年）发生了安史之乱，河西军队大部被调往内地平叛，吐蕃乘虚而入，甘州遂于建中二年（781年）沦陷。大中四年（850年），张议潮于沙洲起义，翌年收复沙、瓜、伊、西、肃、甘、兰、鄯、河、岷、廓等十一州，甘州复归于唐，但不久又于咸通十三年（872年）为甘州回鹘攻陷。

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元昊击败甘州回鹘攻占甘州，设置甘肃军司、镇夷郡、宣化府等管理机构（图2-3）。西夏宝义元年（1227年），成吉思汗军破甘州。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于甘州建甘肃路总管府，后改为甘州路总管府。至元十九年（1282年）立甘州行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立甘肃行省，以控制河西诸郡，治所均为甘州。至大四年（1311年）还在甘州设立了甘肃行枢密院，总领全省军务。因张掖地处河西枢纽，元时期在此设置了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驿站，并有“甘肃纳邻驿”驿道北通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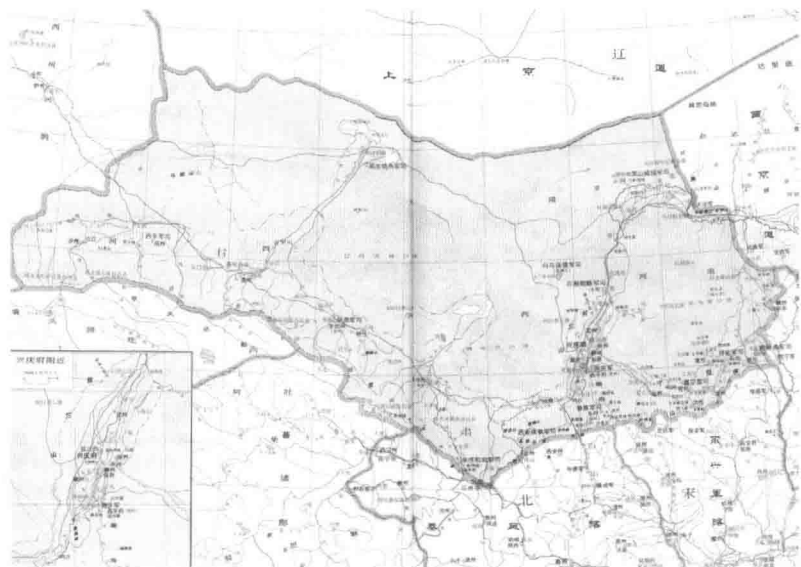


图2-3 西夏贞观十一年（1111年）时的疆域（源自《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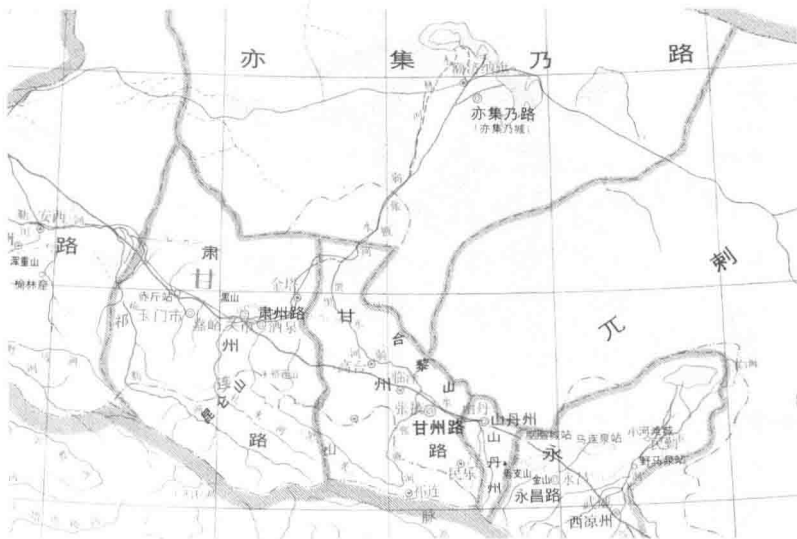
林。这样甘州就成为甘肃行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图2-4）。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274—1275年曾居甘州达一年之久，他曾写道：

“甘州是一大城，即在唐古忒境内，盖为唐古忒全州之都会，故其城最大而最尊。”<sup>①</sup>

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平定甘肃，并置甘肃卫于甘州，隶陕西都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甘肃卫为甘州卫，隶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迁至甘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肃王朱模就藩甘州（四年后又移至兰州）。在军事上，当时甘州设有左、右、中、前、后五卫，卫所均在甘州城内（图2-5）。在明代，甘州还是西北茶马互市的中心之一，朝廷先后于甘州置甘肃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等机构管理贸易。明代中后期，吏治腐败，战事频仍，经济日趋凋敝。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甘州为李自成军贺锦部所克。

清顺治二年（1645年），陕西总督孟乔芳平定甘州，沿袭前朝之制。三年后发生了米喇印、丁国栋的叛乱事件，动乱中所有官方

图2-4 元至顺元年（1330年）时的甘州  
（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改动）



①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12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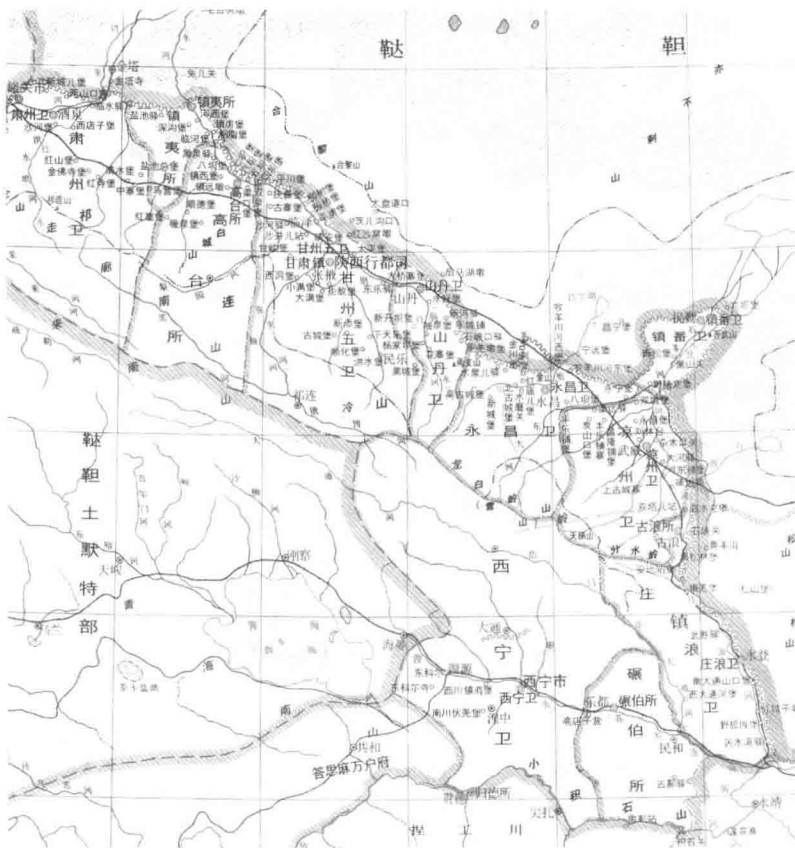


图2-5 明万历十年(1582年)时的陕西行都司  
(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改动)

档案均被毁掉<sup>①</sup>。康熙二年(1663年),置甘肃提督军门于甘州。雍正三年(1725年),设甘州府及张掖县(图2-6、图2-7)。光绪年间,左宗棠曾在甘州大兴土木开展建设、兴修水利。辛亥革命后,于民国二年(1913年)废甘州府,之后张掖县先后属甘肃省河西道、直隶甘肃省、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区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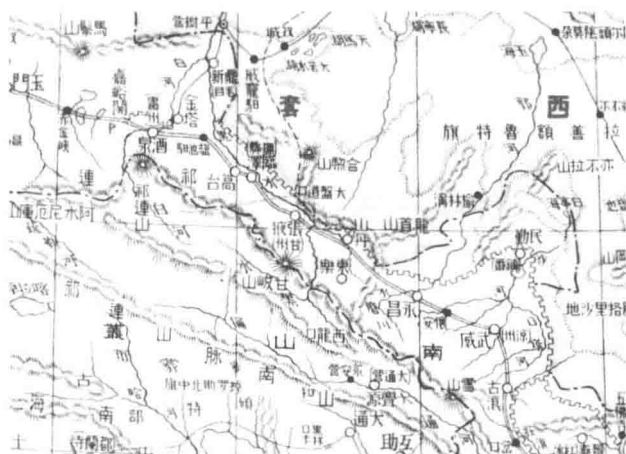
从悠久岁月中走来的张掖享有丰厚的文化遗产。1986年,张掖市被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到2004年止,包括大佛寺在内,张掖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另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2处。

<sup>①</sup>《重刊甘镇志·序》：“……甘州一志，前未有缺焉。兹因五年逆回米喇印反叛作乱，公署册案，悉被焚烧……上下数百年间，事有可采，人有可风，竟委之寒烟蔓草，后之承乏者亦何所据而兴起也哉？”由此可知，清代以前档案资料的缺乏使了解大佛寺的早期历史变得十分困难。

图2-6 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时的甘州府，  
有改动  
(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图2-7 民国时期的张掖  
(1926年)  
(采自民国《甘肃省图》)



古城张掖的沧桑历史总是给人以无限感慨，清代胡悉宁《登甘州城楼》就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紫塞岩疆古镇雄，并干独倚夕阳中。  
三边锁钥河山壮，万国车书驿路通。  
遗种几人成素业，谈经何处问高风。  
千秋极目空惆怅，碛远烟昏没暮鸿。

## 第二节 张掖的城镇建设

### 一、北边防线

明代所奉行的防御北元的军事方略，是在明王朝北部形成和建立起来一条抵御北元侵袭的防线，这条防线的基本格局建立在彼此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上，奠定于洪武至永乐年间，洪武年间朝廷在北部边境开始进行全面的防御布置，朱元璋五次北征，确定了明朝边地的稳定局面，永乐年间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防线。明王朝不仅在北部修筑长城，并且在沿线及附近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加强防御，各设巡抚以分巡各地安抚军民，并提督其他军务。《明史·兵志》载：

“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是为九边。”

这九个边防区的中心皆叫镇，由此形成了明代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自东向西、首尾相连的边关重镇，其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形成的蜘蛛网似的防御结构，成为明代北方边境国防体系上的一条庞大的链条。这九个军镇的具体设镇时间多不可考，但总体来说，九边重镇设于明初，正统、嘉靖时期不断充实，形成了边镇防线。各镇设总督、总兵官等进行统辖，下设有副总兵官、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职，统领军士分布于各地，烽堠相望、卫所<sup>①</sup>互联。

在西北边境上，北元河南王拥有的十几万兵马以及吐鲁番和西番各部对明王朝施加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平凉、固原一带，外乏屏蔽，故胡骑深入于巩昌，若夫延

<sup>①</sup>《明史·兵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者为百户所。”

安、庆阳，则原野萧条，兵马精动。宁夏跨有贺兰、黄河之险，虏骑难于驰骤，故设防较易。有明一代受降城久弃不守，移镇榆林，河套划为虏有，烽火遂达于内郡矣。凉州以西，左西番、右鞑虏，而肃州尤孤，吐鲁番辄肆，侵犯为河西忧。”

河套地区为北元的势力范围，北元以河套为基地，入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而明代在西北设置的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则是明朝北部防御体系链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抵御各部进攻的军政重镇，从地理位置上讲，固原与宁夏南北垂直，东可以顾及榆林，西可以顾及甘肃，为中制之地，三面联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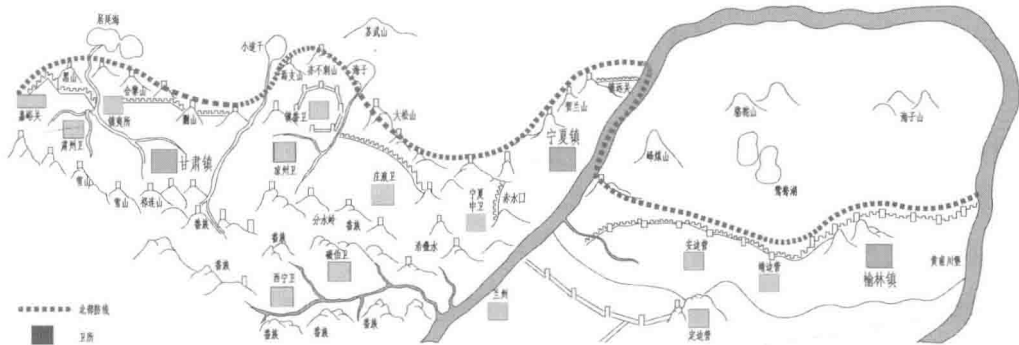
“延绥、宁夏、甘肃所处要冲，士马强健，仍称雄镇。甘凉星悬于河外，宁夏株守于横城，榆林一带虏幕千里，固原居调度之中。”<sup>①</sup>

这四镇形成了以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为前沿要冲，固原镇居调度中心的西北三边<sup>②</sup>地区军事防御态势（图2-8）。

## 二、置甘肃镇

永乐之后辽东与宣府、大同之间的联系阻断，而甘肃、宁夏、延绥的西北边防线仍然连接贯通，终明之世西北边镇变化较小，而

图2-8 西北三边总图  
（根据清康熙六年《陕西通志》  
绘制）



①（清）刘于义：《陕西通志》，清康熙六年（1667年）。

② 清康熙年间《陕西通志》的三边总图中注明，三边自黄甫川至嘉峪关，东西全长三千七百余里，南北长短不齐，远者千余里，近者二三百里。



保卫着西北边疆，屹立于北边防线最西端的甘肃镇则为明代北边防线规划上的西翼支撑点，“京师犹人之腹心也，宣、大项背也，晋、蓟、东辽，肘腋也，延、宁肢体也，甘肃，踵足也”<sup>①</sup>，时人将甘肃镇比作北边九镇之中的踵足，也说明了它的重要性，甘肃镇关乎关陇的动静，牵系云晋的安危，牵动天下的治乱，它对维护关陇以及中原地区稳定的战略意义重大，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功能。甘肃镇所统辖的甘青等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控制着中原王朝通使西域的法定通道，该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原王朝与西域诸政权的正常往来和中原地区的安全。

明王朝建立之初即面临着来自北部蒙古势力，南部西番各部和西部吐鲁番的侵扰，因此甘肃镇的设置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有密切的关系，设置甘肃镇既要把守北边长城和河流中下游河口，又要管理南部祁连山各处隘口、安定四卫和西番各族，防止蒙古南下与羌番联合，同时还需紧控西面的关西七卫及东察合台汗国，与仅一边临敌的其他边镇相比，甘肃镇地处蒙、羌、番、回之间，星悬海外，多面受扰，尤为难守。

“夫一线之路，孤悬凡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山势旷远，中间可以设险之处固有，难于设险之路又多。”<sup>②</sup>

甘肃镇在九镇之中，位于明代北方防线的最西端，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设镇最早的边镇之一，甘肃镇总兵也是洪武期间北边防线较早设置的总兵官，足可见明王朝对甘肃镇战略地位的重视。清乾隆二年的《重修肃州新志》载：

“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将兵略定河西。甘肃镇，即汉河西四郡地。明初，下河西，弃敦煌，划嘉峪关为界。”

“洪武十年正月甲午，置陕西行都司指挥使司于庄浪，后徙甘

<sup>①</sup>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都御史良乡赵锦记云，见（清）杨春茂：《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

<sup>②</sup> （清）杨春茂：《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